

# 试论情态动词“得(děi)”的来源

趙 葵 欣\*

**内容提要** 本文讨论情态动词“得děi”的来源，认为表需要/必要的情态动词“得děi”来源于表可能的“得dé”，提出了“条件可能 > 需要”的模态演变路径。对可能的内部否定在语义逻辑上等于需要的外部否定是从条件可能演变为需要模态的语义基础。表可能的否定形式“不得VP”及双重否定“不得不VP”的使用，为这种演变提供了可能的句法环境。唐五代时期“须得”的连用，更进一步巩固了“得”的需要/必要模态用法，并促使“得”从“不得不”形式中独立出来。汉语“得děi”的这一演变路径，还可以在高地德语中找到旁证。“děi”的发音是中古“de”在北方方言内部演变的结果，这一音变在 19 世纪末已经发生。

**关键词** 情态动词 “得”来源 语义演变 模态范畴

## 0、序言

现代汉语普通话的情态动词“得děi”，表示“情理上、事实上或意志上的需要；应该；必须”（吕叔湘主编 1999：166）。关于其来源一直不甚清楚。太田辰夫(1958 [2003]：186)曾指出：

“得”读dei的时候，表示“必要”（命令）或“必然”。恐怕

---

\* 福岡大学言語教育研究センター外国語講師

是从“可能”的意义派生的。也就是说,“不得”有表示禁止的用法,它的肯定形式就成为“必要”(命令)的了。但是这比表示禁止的“不得”时代可能要晚。

李明(2001)通过详尽系统的研究表明,先秦已有了用在动词前表可能的“得”,这一情态动词在两汉又出现了表“许可”的用法,到宋代才出现了表必要的“得dei”<sup>①</sup>。这样,太田(1958 [2003])关于“得”表可能、禁止、必要三种用法产生顺序的推测得到了李明研究的证实。但是,关于“得”表需要(必要)用法的来源,李明(2001:62)却表示“不同意太田先生的意见”,因为“‘得(dei)’没有命令的语气,而是表示事实上或情理上需要。”“得(dé)”表条件可能和表准许(否定表禁止)的这二义与表必要的“得(děi)”完全不同。所以“这个‘得(děi)’的来源,我们不能确定”(李明 2001:62)。范晓蕾(2014)提出了一种语义演变假设“条件可能→许可→必要”来解释这个“得děi”的来源,但是她解释的理据只是历史上许可义的“得”与必要义“得”发生时具有同样的句法环境(肯定式),至于“条件可能”如何发展为“许可”,“许可”又如何演变为“必要”,并没有对具体过程进行分析,也没有历史上的语料作为支持。因此,笔者认为关于“得(děi)”的来源尚需做更进一步的研究和确切的证明。

本文尝试探讨这个问题。首先,笔者同意李明先生的看法,“得děi”只表示客观条件或情理上的需要,而跟命令无关。因此本文是讨论情态动词“得děi”表需要(包括条件需要和义务需要),一般也称作“必要”用法的来源。

首先我们认为,表可能的“得”和表需要的“得děi”是有密切关系的,原来是同一形式。这有两方面的证据:一是历史语料。19世纪末的一些官话方言记录,如《五车韵府》(1820、1865)、《Langue Mandarine, Guide de la conversation fran aise- anglaise- chinoise》(1890)等书里,“得”的发音都只有一个,即“de”。特别后一本书里记录有会话文,其中表必要的“得”和表可能的“得”发音一样,都记作“te”。二是现有方言证据。在一些官话方言里,

如西安话、乌鲁木齐话、武汉话,表可能的“得”和表需要的“得”发音一样(李荣 2002: 3876)。

所以可见,普通话里“得děi”的发音分化,应该是后来发生的。这一点下面再说。总之,我们首先确定,表可能的“得”和表需要的“得děi”是有发展衍生关系的,这是进行后面论证的前提。

本文认为情态动词“得děi”的来源是表条件可能的“得”,即提出“条件可能 > 需要”的演变路径。下面从三个方面加以证明。

## 一、语义逻辑

“得”在动词前构成“得VP”结构表可能的用法,一般认为在先秦就已经产生(王力 1990: 341、刘利 2000: 157-159、李明 2001: 13),并且一直延续到元明时期,都还可见这一用法。而且这种可能是“条件可能”,或者叫做“参与者外部可能(participant-external possibility)”,也就是由于外界条件、外部因素导致的可能。如<sup>②</sup>:

(1) 夫国家文质礼变,设若相承至於十世,世数既远,可得知其礼乎?

(论语·为政)

(2) 永败,虜追急,阻淮水不得过。(南齐书·顾欢传)

(3) 七月一日,晓潮落,不得进行。(入唐求法卷一, 8)

(4) 法师告谢已了,回头问猴行者曰:“如何得下人间?”

(取经诗话第三, 237)

(5) 太守公事忙,且不得来,一径着妾等来伏事相公。

(元曲选·扬州梦, 799)

这一“得VP”结构表可能的用法以否定及反问形式居多。这里有杜轶统计《孟子》、《韩非子》、《战国策》得到的数据为证(此表引自杜轶 2007):

表 1 先秦文献“得VP”使用情况

文献范围	“得+VP”总数	用于肯定句	用于否定句和疑问句
《孟子》	63	11 (17%)	52 (83%)
《韩非子》	181	45 (25%)	136 (75%)
《战国策》	173	72 (41%)	101 (59%)

而对可能的外部否定，不可能P（记作 $\neg\Diamond P$ ），在语义逻辑上，跟需要/必要的内部否定，需要/必要不P（记作 $\Box\neg P$ ）是一样的，即 $\Box\neg P = \neg\Diamond P$ （van der Auwera 2001:31），也就是“不可能做什么就是需要/必要不做什么”。举个简单的例子，如果说“去机场不可能坐 25 路车”，那么也就是说“去机场需要/必要不坐 25 路车”。此处所说的“可能”，是参与者外部可能，既包括由于客观条件导致的可能性，也包括由于事理、情理、社会规范等造成的可能性，因为其实事理、情理、社会规范等也就是客观条件的一种。

由于“ $\Box\neg P = \neg\Diamond P$ ”这种语义逻辑上的一致性，从表可能的“得”就有了衍生出表需要、必要用法的可能性。这就是我们认为“得dēi”表外部需要/必要的用法来自表可能用法的逻辑基础。下面看历史语料。

## 二、历史语料

几乎在先秦“不得VP”表可能用法出现的同时，双重否定“不得不（不得不/无得不/弗得不）”的用法也出现了（李明 2001：14），如<sup>③</sup>：

(6) 人臣之于其君，非有骨肉之亲也，缚于势而不得不事也。

（韩非子·备内，115）

(7) 释父兄与子弟，非疏之也；任庖人钓者与仇人仆虏，非阿之也。持社稷立功名之道，不得不然也。（吕氏春秋·知度）

(8) 於大罪之间, 或情有可恕, 尽加大辟, 则枉害良善; 轻致其罚, 则

脱漏重辜。以此之故, 不得不临时议之, 准状加罪。(左传·卷 43)

(9) 战胜, 秦且收齐而封之, 使无多割, 而听天下; 之战不胜, 国大伤,

不得不听秦。(战国策·卷 1)

(10) 臣闻明主莅正, 有功者不得不赏, 有能者不得不官; 劳大者其禄厚,

功多者其爵尊, 能治众者其官大。(战国策·卷 5)

这些例句中, “不得不”的“得”还是表可能的意思, 比如例(6)的“不得不事”就是“不能够不事”; 例(7)的“不得不然也”就是“不可能不这样”。所以整个结构应该分析为“不得+不VP”, 也就是说“得”以否定形式“不得VP”出现, 而正好后面的VP呢, 又是一个否定形式。但是, 这些“不得+不VP”的例子, 在语义上也可以理解为“由于外部条件而需要/必要VP”, 如例(6)可以解读为“由于‘缚于势’而需要/必要‘事’”; 例(7)可以解读为“由于‘持社稷立功名之道’而需要/必要这样”。这样一来, 原来的句法结构有可能被重新分析为“不得不+VP”了, 即整个“不得不”凝聚在一起独立于动词, 表示外部需要/必要义。

“不得不VP”的形式在两汉继续发展, 出现了表义务必要(deontic necessity)的用法, 如(例句来自李明 2001: 23):

(11) 比干曰: “为人臣者, 不得不以死争。”(史记·殷本纪, 108)

(12) 三人非负太守, 乃负王法, 不得不治。(汉书·何并传, 3268)

(13) 须菩提当报恩, 不得不报恩, 何以故?(道行般若经, 8/429a)

这些例子的结构就更倾向于分析为“不得不+VP”了, 如例(11)是“由于‘为人臣’, 所以需要‘以死争’”; 例(12)是“因为‘负王法’所以需要‘治’”等。

而同时, 由于双重否定在语义上即为肯定, 也就是“不得不VP=得VP”<sup>④</sup>。所以原本是“不得不+以死争”、“不得不+治”、“不得不+报恩”的“不得不+VP”结构, 就有可能演变为同义的“得+VP”, 即“得+以死争”、“得+治”、“得+报恩”。这样一来, “得”就能从原来的“不得不”中独立出来, 独自成为

一个表外部需要/必要用法的情态动词了。

实际上，在两汉文献里已经有几个这样的用法<sup>⑤</sup>：

(14) 是女子不好，烦大巫姬为入报河伯，得更求好女，後日送之。

(史记·滑稽列传)

(15) 沛公曰：“君为我呼入，我得兄事之。”(史记7·项羽本纪)

(16) 祗域神乃如是，我促得报其恩。(奈女祗域因缘经，大14，899上)  
特别是例(14)的“得”，已经完全可以理解为表外部需要，即“因为‘是女子不好’，所以需要‘更求好女’”。

不过，“得”的这种用法在两汉，甚至宋以前都还很少。这表明在这一时期“得”已经出现了做表需要/必要义情态动词的条件，不论是语义上还是句法上，但尚未发展，还不能稳定地被使用<sup>⑥</sup>。

另一个对“得děi”的产生有影响的是“须得”一词。根据李明(2001：48)研究，“须得”产生于唐五代，表必要，如(例句(17)、(18)引自同页)：

(17) 扬州文牒出到浙西道及浙东道不得一事，须得闻奏。

(入唐求法卷一，98)

(18) 如对尊严长，须得兢兢底。(祖堂集卷八，174)

(19) 高力士微窥上意，乃私语杨国忠道：“若欲使妃子复入宫中，须得外臣奏请为妙。”(隋唐演义，81回)

(20) 卿虽赞德此能，犹未表其的实，须得对面试谏，然可定其是非。

(敦煌变文·降魔变文)

例(17)“须得闻奏”就是“有‘闻奏’的需要”；例(19)“须得外臣奏请”就是“需要‘外臣奏请’”等，其他例句也一样。

“须”在唐以前就已经是表需要/必要的情态动词了(李明2001、段业辉2002、吴春生、马贝加2008)，如：

(21) 冶者变更成器，须先以火燔烁，乃可大小短长。(论衡·无形)

(22) 太后以为既已之事，不须复发。(汉书·外戚传)

而根据本文上面的分析,两汉时期“得”也产生了表示需要/必要的用法。因此,唐五代产生的“须得”这一情态动词,可以看做是一个同义连用的复合词。而这种同义或近义的连用会让两个词互相渗透,互相带动,这就使得“得”表需要义的用法进一步得到巩固。而且从句法上来说,“须得”的产生和使用,也帮助“得”从“不得不”格式中脱离出来,从而最终促成了情态动词“得děi”的出现和使用。一般认为需要义情态动词“得děi”产生于宋代(李明 2001: 62)的结论,跟本文的这一论证结果也是吻合的。

这样,从历史语料来看,表需要/必要义的情态动词“得děi”的产生过程可以简单归纳如下:首先表可能的“得”以否定形式出现在“不得不VP”里,原本是“不得+不VP”的结构被重新分析为双重否定形式“不得不+VP”,又由于在语义上双重否定即肯定,继而“不得不VP”就发展出“得VP”的用法,整个过程可以简单表述为:不得+不VP > 不得不+VP > 得VP。其中第一步的演变是由于重新分析,第二步的演变则是同义替换。

### 三、其他语言的旁证

表需要/必要义“得děi”的这一演变途径“条件可能 > 需要”,还可以在其他语言里找到旁证。Narrog (2012:189)提供了德语“muozan”演变的例子。

Muozan, 在古高地德语(Old High German, OHG)里是动词,义为“有位置(have place)”,然后演变为“complement-taking verb”,表示外部条件可能或允许(circumstantial possibility or permission),在古高地德语晚期(in Late OHG)发展出了表必要(obligation)的用法。这一用法在中古高地德语时期(Middle High German)、至迟在新高地德语时期(New High German)已经趋于稳定并最终完成。而后,“muozan”表示“外部条件可能或允许”的模态用法就消失了。可见,德语“muozan”的模态演变轨迹也是“动词 > 参与者外部可能 > 必要”。而且,据Narrog (2012:189)的研究,对这种“可能 >

必要”演变途径最多的解释是，这一发展来自于否定用法。

德语“muozan”的演变轨迹跟本文讨论的“得dèi”的发展相当一致。“得”本来是“获得get”义动词，在先秦首先发展出表可能(参与者外部可能)的模态用法，然后到宋代发展出必要义的情态动词用法，继而表可能的“得VP”情态动词用法消失。而且，如前所述，“得”由“条件可能 > 必要”的模态演变也是在否定句环境中才得以发生的。可见，本文拟定的“得”的演变轨迹，在德语模态词“muozan”的演变中得到旁证。

#### 四、关于dèi的发音

最后，讨论一下“dèi”的发音问题。Li (2004 : 213) 认为“The pronunciation *děi* may be a recent innovation, ..... it may be borrowed from other dialects, e.g. Sichuan and Shannxi.”(发音dèi可能是一个近代的创新，……它可能借自于其他方言，比如四川或陕西。——笔者译)。那么是否如此呢？我们来看看“得”以及与它同等音韵地位的几个字的语音变化情况。

得，曾摄一等入声字，《广韵》记作“多则切”，跟它一样同属“曾开一入德”的字还有“贼、北”等。“贼、北”在《广韵》里反切分别为“昨则切”和“薄墨切”，韵母都是“e”。现在普通话里“贼、北”韵母都读为“ei”，所以“得”有“dei”的发音跟“贼、北”的发音变化是一样的，完全算不上特别。只是“贼、北”已经完全丢失了中古音，而“得”在做动词和补语标记时仍保留了中古音。所以笔者不同意“dei”发音借自其他方言的说法，而认为这一发音就是北方官话自身语音变化的产物。“得、贼、北”这几个字发音变化的不平衡在其它官话，如西南官话武汉方言里也有体现。武汉方言里“得、北”都保留了中古音，韵母读为“e”，但“贼”则跟普通话一样韵母变为了“ei”。可见“得”有“de”和“dei”两种发音是完全不奇怪的。

考察 19 世纪的一些字典、辞典及传教士所编汉语教材，可以更清楚地



看到“贼、北、得”语音发展变化的过程。下面是记录 19 世纪官话音系的《五车韵府》<sup>⑦</sup>(马礼逊Robert Morrison) 1820 年版、1865 年版和法国传教士 Séraphin Couvreur (顾塞芬)所编汉语官话教材《法英华会话指南》(1886)<sup>⑧</sup>里这三个字的注音比较。具体见下表 2。表中括号前为原书的记音符号, 括号里用[ ]表示的是用国际音标对该音的转写。《五车韵府》的拟音参考山口(2014), 《法英华会话指南》的拟音参考赵葵欣(2014)。

表 2 19 世纪官话文献里“得”的发音记录

	五车韵府(1820)	五车韵府(1865)	法英华会话指南(1886)
得	Tih ([tiʔ])	Teh ([teʔ])	te ([tɿ])
贼	Tsih ([tsiʔ])	Tseh ([tseʔ])	tse ([tsɿ]) tsei ([tsei])
北	Pih ([piʔ]) Pei ([pei])	Peh ([peʔ]) Pei ([pei])	pe ([pɿ]) pei ([pei])

以上这三种文献, 基本可以反映 19 世纪早期、中期和末期的情况。由表 2 可知, “北”的发音变化发生得最早, 在 19 世纪初就有了“bei”的读音记录, 不过中古音尚未消失。“贼”在两个版本的《五车韵府》, 也就是至 19 世纪中期都还只记录有一个读音, 但在 19 世纪末的《法英华会话指南》里已经出现了两读——“ze”和“zei”。可是“得”始终只有一种读音, 即“e”, 只是韵尾的喉音[ʔ]消失了。可见情态动词“得”读为“dei”在这些文献里都还没有被记录。

不过, 笔者却在Thomas Francis Wade (威妥玛)所著《语言自迩集》(1867 年初版, 1886 年第二版)里发现了这样的记录(威妥玛著、张卫东译 2002 : 62-63) :

从“得tè<sup>2</sup>”和“要yao<sup>4</sup>”里面, 还讹变出来一个“têi<sup>3</sup>”, 它

是北京口语里最有用的助动词之一。它当然还没有获得中国词典编纂者承认,在这种情况下,本书为它选用了“得tè<sup>2</sup>”字,在它的右肩上加一个汉语声调符号以示区别。

这是作者威妥玛在第三章《散语》里对“要”做注解时写下的话。从这段话可知,在威妥玛的时代,表必要义的“得”实际上已经产生了音变,发为现在的“děi”音。只是这种变化由于“还没有获得中国词典编纂者承认”,所以未见诸文献。即使是威妥玛自己,在这本书的正文里也还是把“得”记录为“得tè<sup>2</sup>”,只是在表示必要义的时候写为“得’”,在字的右上角加了一个单引号。笔者本次研究所用《语言自述集》是1886年的第2版,再综合上面表2的情况,至少可以保守地认为,“得”的音变虽然晚于“贼、北”,但是到19世纪末应该已经发生了。

## 五、小结

本文讨论了情态动词“得děi”的来源,认为表需要/必要的情态动词“得děi”来源于表可能的“得”,提出了“条件可能 > 需要”的模态演变路径。对可能的内部否定在语义逻辑上等于需要的外部否定是从条件可能演变为需要模态的语义基础。表可能的否定形式“不得VP”及双重否定“不得不VP”的使用,为这种演变提供了可能的句法环境。首先“不得+不VP”在可以两解的使用环境中被重新分析为“不得不+VP”,继而由于双重否定即肯定而产生同义的“得VP”用法。唐五代时期“得”与表需要/必要的情态动词“须”的连用,更进一步巩固了“得”的需要/必要模态用法,并促进了“得”从“不得不”形式中独立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表需要/必要模态的情态动词。汉语“得děi”的这一演变路径,还可以在古高地德语中找到旁证。“dei”的发音是中古“de”发音在北方方言内部演变的结果,产生时间应该不会晚于19世纪末。

## 附注

- ①为了区别于表可能的“得”，此处将表需要/必要的情态动词“得”记作“得dei”，但并不代表该字在宋代就读为“dei”。这个字的发音问题本文将在后面讨论。
- ②文中用例没有特别注明转引的，均来CCL（北京大学）古代汉语语料库。
- ③以下用例(6)、(7)来自李明(2001：14)。
- ④这里说“不得不=得”是从逻辑语义上来说的，当然在语用上两者还是不同，双重否定一般语气更强。
- ⑤后两例(15)、(16)来自太田(1988：42)。
- ⑥至于为什么从两汉到宋之间，“得”的需要义情态动词用法很少，笔者认为大概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得”在这一时期主要还是做动词和用来表可能，这两种用法太强大，阻碍了其向别的用法发展。其次，这一时期已经有“须、要、用”等多个情态动词来表达需要/必要模态(李明 2001：87)，所以也没有“得”向表需要/必要发展的足够空间。
- ⑦笔者见到了《五车韵府》的两个版本，发现两版本时间相差比较远，而且记录的声音符号也有变化，所以分开考察。
- ⑧《法英华会话指南》为笔者所译中文书名，原书题为《官话Langue Mandarine, Guide de la conversation fran ais-anglais-chinois》，是法国传教士顾赛芬(Séraphin Couvreur, 1835-1919)出版于1886年的一部汉语官话、法语和英语对照的会话手册，或曰会话指南，从性质上看就是一本官话教材。有关此书的详细情况参见赵葵欣 2014。

## 参考文献

- 杜 轶 2007. “得+VP”结构在魏晋南北朝的发展——兼谈“V得C”结构的来源问题，沈家煊、吴福祥、李宗江主编《语法化与语法研究(三)》：1-

- 35 页,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段业辉 2002. 《中古汉语情态动词研究》, 南京: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 范晓蕾 2014. “汉语方言的能性情态语义地图”之补论, 待刊。
- 李 明 2001. 汉语情态动词的历史演变研究, 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 李 荣主编 2002. 《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全 6 卷)》, 南京: 江苏教育出版社。
- 刘 利 2000. 《先秦汉语情态动词研究》,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 吕叔湘主编 1999. 《现代汉语八百词》(增订本),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山口要 2014. 19 世紀漢語官話音系研究, 熊本學園大學博士論文。
- 太田辰夫 2003. 《中国语历史文法》(修订译本, 蒋绍愚、徐昌华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 王 力 1990. 《汉语语法史》(《王力文集》第十一卷), 济南: 山东教育出版社。
- 威妥玛著、张卫东译 2002. 《语言自述集——19 世纪中期的北京话》,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 吴春生、马贝加 2008. “须”的语法化, 《温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1(3): 111-116 页。
- 叶宝奎 2001. 《明清官话音系》, 厦门: 厦门大学出版社。
- 赵葵欣 2014. 《法英华会话指南》所记 19 世纪末汉语官话, 福岡大学『人文論叢』46 卷 2 号: 363-384 页。
- 太田辰夫 1988. 『中國語史通考』, 東京: 白帝社。
- Couvreux Séraphin 1890. *Langue Mandarine: Guide de la conversation français- anglais- chinois*, 直隶河间府: Catholic Mission Press
- Li, Renzhi 2004. *Modality In English And Chinese: A Typological Perspective*. Boca Raton, Florida. Dissertation.com.
- Morrison Rev. R. 1820. 五车韵府 *A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in Three Parts, London: Honourable East India Compay.
- 1865. 五车韵府 *A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Vol.1*,

Shanghai: London Mission Press.

Narrog, Heiko 2012. *Modality, subjectivity, and semantic change : a cross-linguistic perspective*, Oxford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van der Auwera, Johan 2001. On the typology of negative modals, in J. Hoeksema et al (eds) *Perspectives on Negation and Polarity Items*, 23 – 48.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van der Auwera, Johan and Vladimir A. Plungian. 1998 Modality's Semantic Map, *Linguistic Typology* 2.1 : 79 – 124.

## The origin and evolution of the necessity modal verb 得 *děi*

**Abstract:**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origin of necessity modal verb *děi*. It suggests that the possibility sense of *de* is the origin of the necessity sense of *děi*. The semantic basis of the development is that the external negation of possibility is logically the same as the internal negation of necessity. Possibility *de* used in negative environment like “*bùde VP*” and “*bùdebù VP*” provided the syntactic condition for the shift. Its further usage with *xū* (*xūdé*) in Tang and Five Dynasties strengthened the necessity sense of *de* and led to its independence out of the phrase *bùdebù*. Finally it can be used as a necessity modal verb alone. The pronunciation *děi* comes from *de* and this study finds that the evolution had happened by the end of the 19th. century.

**Key word :** modal verb    the origin of *děi*    semantics development  
modality in Chinese